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元明清

巴蜀书社

译注 樊善国 徐梓

审阅 马樟根

元史选译

元史选译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袁庭栋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元 史 选 译

樊善国 徐 勇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18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 元 (第二批50种)

6/10/11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元朝结束了在它以前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从民族融合的观点看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中外交流也空前发展。元朝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南方保持了原有的发展水平，并在许多方面（例如棉花种植的普及等）有新的成就。元朝文化的多样性是显著的。政府使用蒙古文、汉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景教、天主教等并存；在汉族地区，理学成为官学。在科技方面，王祯编的《农书》，以及政府编行的《农桑辑要》，郭守敬的授时历；在史学方面，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在绘画方面，以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为代表的绘画，都是人们公认的重大成就。

在文学方面，以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仁甫、郑光祖、乔吉、张可久为代表的杂剧、散曲作家，使元曲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总之，元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史的重要时期，了解这段历史对认识 and 了解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

明朝攻克元大都的四个月之后，即洪武元年（1369）12月，朱元璋下诏纂修《元史》。这时，元顺帝北逃，国号尚存，纂修一代之史显然为时过早，但明朝君臣还是以“九州攸同”为由，宣布召集儒臣，纂修《元史》。洪武二年二月初一，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坝、曾鲁、赵汭、张文海、徐尊生、黄簾、傅恕、王铨、傅著、谢徽、高启等16人从各地来到南京，齐集于天界寺。朱元璋以中书左丞李善长为监修，翰林学士宋濂和待制王祎为总裁，他还亲自为纂修《元史》制定了指导方针和编纂原则，要求史臣们一定要“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同时要注意“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从此，《元史》的纂修就正式开始了。

修纂工作很快就告一段落，仅188天之后，也就是当年8月11日，上自太祖、下迄宁宗的12朝历史便修纂完毕。这次共修纂得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列传63卷和目录2卷，共有161卷、130万字。由于顺帝一朝的历史没有实录做基础，修纂工作无

法进行，只好暂时停下来。为了完成这段历史的修纂，朱元璋派欧阳佑、吕复、黄盅到全国各地访求史料，而重点在北平和山东。在采访人员还朝之后，洪武3年2月初5，又一次开局修史。这次仍以宋濂和王祔为总裁，纂修除赵坝一人没有变化外，原班人马几乎全部改换，朱右、贝琼、朱世濂、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等14人全是新人。到7月初1，又补修得本纪10卷、志5卷、表2卷和列传36卷。合两次所修，重新加以编次，这样便成就了210卷的《元史》。这部书的修纂，前后历时仅331天，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所费时间之少，成书之速，仅次于沈约的《宋书》。

《元史》的修纂，由于距元朝灭亡不久，很多史事还没有来得及记载，很多史料还没有整理出来。这就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这样就“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所以“《元史》之外舛驳，不在于藏事之速，而在于始事之骤”。实际上，“藏事之速”也不可能不带来问题，由于仓促行事，即使现有的史料也没有能收罗齐备，如陶宗仪的《辍耕录》、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以及宋人的《黑鞑事略》、《蒙

《秘备录》等都没有为史臣们所注意。再加上修纂者大都是江南文人，少有北方儒士，更没有蒙古或其它民族的学者。特别是蒙元历史的特殊性，在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前，即已有4朝70多年的历史；元朝建立之后，在中国本部之外，更有钦察汗、伊利汗和察合台汗国三大宗藩，有关这些方面的重要史料，如《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也都没有能利用。所据史料，顺帝以前主要是《元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元一统志》、《国朝名臣事略》及《后妃功臣列传》，顺帝一朝的历史，则主要是据《庚申帝大事记》及其它采访材料写成的。

在这样一种史料基础上修史，也就难免会轻重失序，出现某种不平衡。如在“二十四史”中，全部本纪占全书的八分之一，而《元史》的本纪则占四分之一。所以如此，是因为本纪的写作有史料可据，修纂《元史》最基本的材料《元十三朝实录》，就主要是为这一部分所采录。另外，即就《元史》的本纪而论，也极不合理，蒙古国4帝70多年的历史，只有3卷，而世祖一朝，就多达14卷，宁宗本纪也有10卷之多。详细的记载，虽然给了我们许多便利，但我们以同样的标准去看待其它，则不能不说它失于疏略。特别是定宗之后，宪宗以前3年间，史臣以“其行年之事，简策失书，无从考也”为由，

竟不着一字。史料工作准备不足，同样在列传部分也反映得很明显。由于史馆人员对蒙古人和色目人了解不多，立传很少，即使有传，内容也较空洞。如见于《宰相表》的蒙古人有59人，立传的却不及一半，见于《宰相表》的色目人更多，立传的更少。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立传，太宗以后皇子则没有一人立传，许多开国功臣也没有被立传。相反，由于文人学士多有墓志、家传和行状可用作依据，因此，《元史》列传中这类人的传记占有很大的比重。

如果说史料的不齐备只是造成了全书各部分的不平衡或诸多缺憾的话，那么，仓促草率所带来的问题就更加严重。最明显的是人名不统一，在《元史》中，同为一人，由于译音的关系，往往以好多个异名出现，如“速不台”又作“雪不台”、“唆不台”，“肖乃台”又作“笑乃觶”、“笑乃带”，“八思巴”又作“八合思巴”、“八哈思巴”。更不应该的是，一个人在同一卷中，名字也没有划一，如在《耶律楚材传》中，权臣奥鲁剌合蛮，在随后的一段文字中，又写成了“奥都剌合蛮”。又有一人两传的，如卷121有《速不台传》，随后的一卷又重出了《雪不台传》；卷131有《完者都传》，仅隔一卷，又重出了《完者拔都传》；卷150卷是《石

抹也先传》，而卷152又重出了《石抹阿辛传》。这种连传主也分辨不清的特大错误，可能是由于这些传记不出自一人之手，而总裁官又因为译音关系，未能加以分辨造成的。至于随手抄录原文，不加任何查考，以至于有姓无名，如何主簿、裴县尹、耿参政、王征事、李承事、张奉政之类甚多，难以一一列举。

《元史》的这些问题，不仅为后人所诟病，即使当事人也不满意，如撰写《外国传》的宋禧，在他寄宋学士的诗中就不无自嘲地说：“修史与末役，乏才愧群贤，强述外国传，草疏仅成篇”。把《元史》修纂者那种力不从心、苟且塞责的心理说得很明白。书成后不久，参与其事的朱右就作了《元史拾遗》。后来主持《永乐大典》编纂的解缙在洪武末年奉朱元璋之命，对此书加以改修，并写作了《元史正误》。后人提及《元史》，除赵翼有少许称赞之词外，其它的都是不遗余力地批评。顾炎武说它的各个志都是抄袭而成，没有经过一番“熔范”。钱大昕挖苦修纂人员都是些“草泽腐儒”。章学诚就其各部分的严重失调干脆说：“《元史》二百十卷，而纪志先去其半，不待观书，而知其无节度矣”。这些批评，极大地诱发了人们修订改作的动机。

这种修订改作从明代就开始了，胡粹中就著有《元史续编》。清代考据学兴，纰漏百出的《元史》成了人们竞相考订的对象，以至于使对元史的研究从此成为显学，并极大地影响了以后学术的发展。清初邵平远的《元史类编》，对《元史》就多有订正。乾嘉时期的史学大师钱大昕对《元史》致力尤深，虽有志改作而未能如愿，但一些零星篇卷，也都很见功力。其后魏源又独作新裁，自为体例，撰著了《元史新编》。汪辉祖以《元史》校正《元史》，写成《元史本证》，指出了《元史》的3000多条谬误，对《元史》做了系统的证误工作。从洪钧开始，对元史的研究，随着对史料的新发掘，从而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他所著的《元史译文补正》，用域外史料，证中国之所未确，补中国之所未闻，多有创获。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增人所无，详人所略，可谓别具一格。更有柯劭忞，广收慎用，博采约取，综合各家，排比纂辑，以一人之力著成《新元史》，被北洋军阀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明令列入正史之中。

《元史》的问题是如此严重，但600多年来，一直没有被废弃；后来的改作是那样多，但都没有能替代《元史》，这说明了《元史》是有可取之处的。

首先，《元史》所依据的基本史料《元十三朝实录》非常珍贵。尽管元代的史官制度不是很完备，实录的修纂没有日历、起居注做基础，但从成宗大德年间纂修前四汗和世祖朝的实录开始，毕竟形成了元代修纂实录的制度。

如此相沿修成的《元十三朝实录》，是蒙元时期最系统、最详细的编年史料。由于元朝的实录只是在修成之后缮写一份进呈，又规定不得让外人传阅，所以是十分珍贵的孤本和秘本。《元史》的修纂最大限度地依据了这份史料，本纪部分正是由此节录而成的，并且篇幅较大，这就难能可贵地保存了第一手材料。在《元十三朝实录》遗失之后，《元史》也就成为其它史书无法替代而且必须依据的对象。

《元史》所依据的另一份重要史料是《经世大典》，这是元文宗时以赵世延、虞集为总裁，元朝官修的一部政书。《元史》的表、志部分，就主要是依据此书写成的。如《百官志》、《三公表》、《宰相表》取自《治典》，《食货志》取自《赋典》，《礼乐志》、《舆服志》、《选举志》取自《礼典》，《兵志》取自《政典》，《刑法志》取自《宪典》。此外，《地理志》主要是据《大元一统志》写成的，《天文志》吸取了郭守敬的研究成

果，《历志》则是根据李谦的《授时历议》和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编撰而成的。总之，众多的史料如百川归海，汇综到这里，并借《元史》得以保存下来，这是《元史》所以长存不废、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得以专美于前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元史》作为一部210卷的大书，有些部分也是写得成功的。《食货志》、《百官志》、《兵志》及《刑法志》的内容都很充实，所以赵翼称“一朝制度，亦颇详赡。”特别是诸志之序，对有关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叙述得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为后人了解蒙元时期的各种制度理出了一个纲目。由此可见修纂者视野开阔、综合能力强，有较敏锐的历史感，是颇具史识的。

与它的修纂一样，《元史》的刻印也很快完成，洪武3年7月，《元史》修成，10月便镂版刊行，这个洪武本，就是《元史》的祖本。嘉靖时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就是用的洪武旧板，只是损坏的部分才加以补刊，这个递修本被称为南监本。万历时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又有了北监本。此后的印本大都是据南、北监本翻刻的，有些还有所改动。民国时期，张元济主持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元史》是以99卷洪武残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的。1976年中

华书局所出的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并依另一部144卷的洪武残本和南监本，改正了百衲本在影印过程中的近80处描修错误，又用各种较好的版本进行校勘，还参照许多改作及一些原始资料，校正有关史文，写出了很有份量的校勘记。本书所依据的就是百衲本和点校本。

为了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元史》的面貌，我们从本纪、志、传中各选了部分篇目，包括成吉思汗、忽必烈，及26位各族人物的传记，还节选了《地理志》、《选举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的部分内容。人物传记基本按人物的生年先后排列，生年不详者按卒年排列。根据这套丛书的编写要求，每篇原文前面都有一段简短的说明文字；原文有的也是节选，但内容均以原文为准；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以说明问题为原则；译文用语体文，努力做到流畅通顺。但由于水平的限制，译注中错谬一定很多，诚挚地希望读者指正。

樊善国、徐 勇

1991年初于北京师大
古籍所